

无处不在的伦理学要义及影响

一一建筑伦理学理论及其与房地产业的嫁接与应用

建筑伦理学，主要讨论如何运用基本的伦理准则去分析解决建筑发展与建筑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城市规划中的伦理问题等。

伦理问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准则，或曰价值之不同取向。伦理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主要准则，这其中又涉及宗教、道德和法律。建筑伦理问题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未深入涉及的，建筑学和伦理学两学科相互交叉的前沿学术问题，是今天建筑界比较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筑伦理学包含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精神层面是建筑伦理的深层内核，主要讨论建筑的意义体系，将建筑活动放在人类生命活动与存在意义的高度去理解和阐释。文化层面主旨是将动态的建筑历史观引入建筑伦理的研究之中，即把建筑的伦理现象同延绵不断的建筑文化史连接起来，以揭示建筑与伦理的历史关联和内在逻辑。

古代建筑伦理学

伦理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伦理学是研究这种存在的学问。在古代，往往把伦理视为社会的一种永恒的价值准则。建筑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对象物，也必然具有同样的伦理结构。中国古代建筑的伦理性，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同构，这也可以说是建筑伦理学中结构最完整和稳定的一个伦理系统。中国古代的建筑型制，就是它的伦理性的反映。如古代的都城型制就有一定的规范性：“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例如浙江东阳一带的许多大宅，因为当时屋主人官衔不大，所以不能做斗栱、歇山等较高等级的形式；但他们很有财富，要想表现自己较高的身份，只好在建筑上做许多雕饰，木雕、砖雕、石雕样样有，梁、柱、枋、檐都雕得满满的。这种做法首先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要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

古代居住建筑的伦理准则，乃是多进四合院住宅形式的重要依据。这种伦理准则，已经道德化了，因此走向习俗，历朝历代，人们自觉地遵循着。其实，“风水”也一样，在“风水”的背后也隐含着伦理。

西方古代建筑的伦理性与中国古代的不同，它充分反映伦理结构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演变。古希腊的神庙形式为一神一庙；但到了古罗马则设万神庙，把

许多神祇合在一个大空间中，并不觉得玩世不恭。中世纪的建筑伦理，既是对古代的否定，又抵制后来的文艺复兴建筑伦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后来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都以巨大的圆穹顶形式来表述人文主义思想；而教会却反对这种形式。这看来似乎是宗教教义之争，但实质上却是思想性的、伦理秩序的。

现代建筑伦理学

在现代，建筑的伦理取向可以从下述三个问题来入手研究。

一是关于古建筑的保护。举例说，上海豫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不但要保护好豫园，而且还要保护其环境。在豫园附近不准建造有碍视觉形象的建筑。建筑伦理与“文物保护法”起着共同的作用，即德与法的互补性。又如纽约的利华大厦，建于 1952 年，但也成了文物性建筑，它的价值主要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它的社会文化地位，它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而获得较高的价值。

二是关于旧城的改造。当今改革开放，建筑规模和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但在旧城改造中，更应当重视建筑的存在与改造。一座建筑是否应拆除或改造，这也涉及建筑伦理学。上海鲁迅纪念馆，其建筑本身也成了文物性的建筑，在改造、扩建中保留其典型的一部分，则是上策。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旧的保留下来，在其东侧建造新馆，即“东馆”；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也同样如此。而且新老建筑之间都做得很协调。保留和修缮有价值的建筑是一种积德！

三是关于新建筑的形式法则。80 年代中期，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方案中标。这个方案好在何处？显然，他要在这里创造一种标志性形象，甚至成为将来洛杉矶建筑的符号（他认为这里本来的建筑文化是一片空白）。所以这座建筑不是一般的现代派建筑，而是以小的几何形块体作有机组合，形成鲜明的个性。这种意图显然也是对建筑价值的追求。因此在造型的深处仍然具有伦理内涵。建筑师应该深谙伦理学并付诸于实践。

2000 年威尼斯双年展提出了“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的主题，第八届主题是 Next（下一波），第九届的主题则是“蜕变”，似乎是在继续思考在“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这个大的方向中，我们的建筑要怎样前行。毕竟，“建筑不能降格为只是具有美学价值或技术价值，应是对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应帮助表达出某种共同的精神风貌。”改进我们的生活，才是建筑

的本质目标。

建筑伦理学与房地产业的嫁接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业，现存的最迫切的建筑伦理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尽可能担负社会责任为大众服务，一方面是如何面对传统，如何对待传统的建筑形式和遗存的古建筑与旧城。

社会责任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前不久，任志强和潘石屹在网络上在现实里在各个媒体中进行了关于该不该划分“穷人区”和“富人区”的讨论。前者一再说的是现实——“二十年后仍然存在……”，后者谈的却是理想——“绝对不该划分……”。根据两年前的统计数字，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大概有 4000 万，其中只有一半确实在享受社会低保待遇。或许建筑师也好，房地产商也好，都不是阻止社会贫富分化的神医。只是，这部分城市平民生活在什么样的居住条件下，甚至是在哪儿生活，却是建筑师中的有识之士可以而且应该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城市道路愈宽，那是为汽车准备的；我们的高楼林立，那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城市不可避免的走向精英化，越是精英化，越无法摆脱带有铜臭气的“全球化”的影响，越容易陷入对国际明星建筑师的盲从中。这样的结果是传统和地域特色渐渐消失，城市中将塞满带有明星建筑师们个人标签的建筑，无从分辨哪儿是北京，哪儿又是纽约。

现在各大城市都在建造经济适用房，号称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是为低收入平民准备的。就北京来说，经济适用房远离市区，生活设施虽然相对齐全，但仍有多种不便，家庭生活在于市郊，上班仍然需要进城来，交通时间和交通费用的投入都不可小觑。不少经济适用房为了节约成本，小区环境乏味，建筑造型单调，社区内部关系冷漠。

另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古代建筑或各种遗存，还有一座座老城、旧城，现在不少人认为，不能赚钱就不应该留存，毕竟不少古建筑都恰恰在寸土寸金之地；不能赚钱就应该想法发掘它们能赚钱的因素，要改造它们把它们打扮漂亮了“卖给外国人”或者“卖给有钱人”。

我国大量的古建筑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看似“虚”的信息里有无穷的价值，有些价值是可确知的，有些价值可能并未显露出来或者以我们现在的水平还不可知。可旧城的一个又一个地块却被推平了。北京被划出来要保护的“25

片”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借口被蚕食着，其他城市内部的旧城区恐怕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旧城就像家里的老人，是让他自生自灭放置不管甚至急不可待的将他消灭，还是想尽办法令他延年益寿呢？在家庭伦理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城市和建筑问题上，我们却束手无策，甚至觉得唯有拆迁才是硬道理。

或许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做法，威尼斯双年展的场地就是以绿园城堡（Giardini）与旧军械库（Arsenale）两处老建筑群为主要展区的。绿园城堡园区内有自 1895 年以来的 20 多个国家的国家馆，与原有建筑一起留下了新的历史痕迹。Arsenale 原意为“船坞”，所属地点为前海军所有，自 1999 年第 48 届威尼斯双年展（视觉）开始作为展场。此处负有造船、制绳与储藏军械的功能，所以才被以军械库通称，其中建造年代最久的制绳场始建于 1303 年。同样是历史悠久的古迹，威尼斯双年展开发出了它们新的实用功能，而它们又将继续作为历史见证得以保留，不断有更多的历史信息叠加其上。